

第一章 闽文化的源流和特点

一 闽文化源流

闽文化的形成经过了漫长的时间，其过程是极为复杂的。从总体上看，它的形成与以下几个方面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古越文化的遗风。古越族是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的总称，福建的土著居民是古越族的一个分支，称为闽越人。虽然随着中原汉族人民南迁入闽，闽越人在福建各地主人地位逐渐被替代，但其悠久的文化传统却不同程度地被保存。比如福建闽越人图腾蛇。《说文解字》云：“闽，东南越，蛇种。从虫，门声。”这里的“蛇种”就是“蛇族”，即信仰蛇神的氏族。“闽”字的造字是从虫，门声。“虫”字通“蛇”，解即家门供奉蛇的氏族。闽越人所以图腾蛇，是因为祖先生活在湿温的丘陵山区，溪谷江河纵横交错，许多蛇类繁衍滋生其中，对闽越人的生命和生产造成极大威胁。《太平广记》引《宣室志》云：“泉州之南，有山焉，峻起壁立，下有潭，水深不可测，周十余亩。中有蛟螭，常为人患，人有误近，或牛马就而饮者，辄为吞食，泉人苦

之有年矣。”因此人们在近山的岩石上刻画蛇形以祈求神灵的保护，并建庙供奉，希望能借助于祈祷来企求好的结果。这种崇拜沿续至今，到今天福建还有不少地方保留着蛇王庙。如闽西长汀县西门外的蛇王宫、长汀县平原里溪边的蛇腾寺、福清和莆田等地的蛇王庙等。平和县三平寺与漳浦县交界一带的村民，一直把蛇尊为“侍者公”把蛇当作“神明”加以顶礼膜拜，蛇与人同床共寝和同室共处更是司空见惯的事。南平樟湖板的崇蛇习俗至今还极为隆重，每年六月下旬村民四出捕蛇，七月七日那天组成浩浩荡荡的迎蛇队伍，将蛇送到蛇王庙前的闽江放生。福建武夷山一带闽越人的悬棺葬距今已有 3400 年的历史，但这些悬棺并不是每具均有骨骸，有些空棺是为同族死者准备的，这是因为血缘氏族社会的族葬要将同族葬于一处。这种葬俗至今在某些地方仍流行。如武夷山脉松溪县花桥乡狮子崖险峻陡峭，其山崖裂隙中有深达 100 多米的“万棺洞”历代存放在那里的棺柩达百具，层层叠架在沿内，下层年代古远者已陆续腐朽，上层的棺柩则有些是当世放进的。

中原文化的传入。其传入方式主要以大量移民的途径为主。中原汉族曾四次大规模进入福建，第一次是西晋末年的八姓入闽。这八姓多为中州的簪缨世胄，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他们为避永嘉之乱而携眷南逃，都带着自己的宗族、部曲、宾客等，大大增加了福建地方人口。第二次是唐代陈元光开发漳州。河南光州固始人陈政于唐总章二年（669 年）率府兵 3600 多人进入漳州，年仅 13 岁的陈元光也随父进漳，21 岁时承袭父职，定居漳州，并大力开发漳州，使漳州改变了昔日满

目榛莽的荒凉状况，促进了地方社会的迅速发展（也有学者对“八姓入闽”和“陈政入漳”有不同看法，笔者对此已有专文探讨，此不赘）。第三次是唐末五代王审知治闽。河南光州固始人王审知曾与其兄一起率中原人马五千余人入闽，定都福州，后被封为“闽王”。他为治理福建作出了卓越贡献，使福建在中原动乱之际成为东南的富裕之邦。第四次是北宋南迁。宋室南渡前后，北方百姓为避战乱，再次出现南迁浪潮，大批人扶老携幼入闽，使福建地方人口急增。除了这几次大规模入闽外，从永嘉之乱前至明清，都有中原人士陆续入闽定居。早期这些入闽者大多为逃亡或流放者，后期多为驻闽将士、赴闽仕宦者和为避乱而投亲靠友者。唐五代时河南固始来投奔王审知的，多不胜数。这四次大移民和陆续进入的大量移民，都不同程度地带来了中原的先进文化，加快了福建的开发和进步。此外，名士南下和闽人北游也或多或少地带来了中原文化。从唐德宗年间常袞任福建观察使起至明清，大批中原名士或慕名前来投奔，或为闽地秀丽山水而至，或前来授课讲学，他们虽然没有在闽定居，有的在闽时间也并不长，却为闭塞的福建吹进了新鲜的空气，活跃启沃了闽地学术文化。宋南渡之后，大批北方名流蜂拥而至，一时成了风气。此外，唐中期之后，闽人开始中进士第，由此纷纷北上，受到中原文化的熏陶，他们宦游归里时带回了中原文化。还有不少闽人北上访学，也将中原文化带回闽地。如理学开创者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邵雍等都在北方中原一带，不少闽人投奔其门下，深受其影响。崇安人游酢、将乐人杨时亦受业于二程，曾有“立雪程门”的故事。他们返回闽地后大力传播理学，后被

朱熹改造发扬为“闽学”。泉州人谭峭是唐五代的大哲学家，他到北方“经终南、待太白、太行、王屋、嵩、华、泰、岳迢迢游历名山（南唐沈汾《续仙传》卷下），谭峭提出以虚、气、化范畴为核心的哲学，为宋明理学家从不同方面所汲取和效法，成为唐宋哲学发展中一个承上启下的中间环节。

宗教文化的传播。四大宗教在福建极为兴盛，传播速度极快。佛教传入中国约在东汉初年，而西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福州正处开发之际，已有了“绍因寺”佛寺。晋太康九年（288年）南安也有了“延福寿”。唐代马祖道一禅师入建阳，是闽地禅宗的开端。当时中国佛教宗派林立，主要有盛于北方的“渐悟”和盛于南方的“顿悟”两支，故有“南顿北渐”之说。唐中期因寺院经济与国家利益矛盾日深，皇帝发布诏令，废除佛教，当时全国被迫还俗的和尚尼姑约26万人之多。福建虽有所波及，如莆田寺院被毁不少，“洎武宗乙丑（845年）之否，邑之东有敬善寺，民井而居之，乾有玉涧寺，民亩而田之。”（《黄御史集》卷五），但福建毕竟远离政治中心，山高皇帝远，佛教一直很兴盛。“顿悟”到唐末能衍为五宗，与福建有极大的关系。如临济宗的始祖义玄是福清人，黄檗希运的门徒，沩仰宗创始人沩山灵祐是长溪人，曹洞宗创立者之一本寂是莆田人，立云门宗的文偃出于南安人义存门下，立法眼宗的文益则为闽县人，师备的再传弟子。长乐人怀海运用中国儒家的宗法制度，改造印度式的佛教戒律，制订出一套适合中国禅宗特点的清规戒律，称《百丈清规》或《禅门规式》，使印度佛教戒律中国化，成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丛林佛寺戒律的创始人。当时不少福建人撰写的佛教著作誉满佛林，如莆田释文矩的

《博山经》仙游释叔端的《宗镜四缘》建州释慧海的《顿悟入道要门论》、希运有《黄檗断际禅师宛陵录》等。王审知治闽时笃信佛教，在闽地建佛寺 267 座，闽王发给文凭的出家僧尼，竟有三万多人，故有“山路逢人半是僧”之诗。宋元明清至近代，佛教在福建也始终没有衰竭过，如宋末元初，仅福州府统辖的各县就有佛教寺庙 1500 座以上，这在全国来说也是罕见的。福建名僧不但常奉诏晋京，授经讲法，还常飘洋过海。如唐代泉州超功寺僧昙静，曾追随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元代的明极、楚俊等曾赴日本讲经；明代漳州名僧觉海亦赴日本长崎传法，并在长崎建有漳州寺。道教传入福建的时间较早，在原始社会时期，福建就有方士活动踪迹。武夷山被列为道教“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的十六洞天，称为“真升化玄天”，升华元化洞天真真人刘少公为武夷山主。秦时，在武夷山修道的有崇安人潘遇、闽清人游三蓬，并在山中建“止止庵”宫观。西汉时，浦城子期山、福州九仙山、南平衍仙山等都有道士在修炼。唐代时福建出现了道坛庙观和职业道士，福州著名的道士有张林、符契元等人。五代时，王审知敬重道士，不少道士握有大权。宋代福建道教发展很快，不少道士屡受朝廷赏赐，新建道观如雨后春笋，著名的如福州“真庆观”、延平“元妙观”、莆田“元妙观”、闽县“崇禧观”、沙县“宜福观”、松溪“文昌观”等。泉州清源山上巨型石刻李老君像，高约一丈五、六，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由此可看出当年道教的兴盛。宋元之际江西兴起“净明忠孝道”，注意符篆禁咒驱邪御瘟等道术，从事服炼斋醮、修仙度人，福建亦由此出现炼养、符篆两派。前者代表人物如泉州龙兴观道士吴崇岳、长汀人王中正、崇安人杨万大

等。后者代表人物如漳州天庆观道士邱允、沙县人谢祐、长汀人梁野等。到明代 道教被取消‘天师’称号 福建出现正一道和全真道。清代因乾隆宣布黄教为“国教”，道教被认为是汉人的宗教 所以开始衰落。但在福建 民间祈祷斋醮之事及服饵丹道之术仍旧流行，并逐渐成为民间习俗。公元七世纪初在阿拉伯麦加城诞生的伊斯兰教，早在唐中叶就由航路传入泉州。宋元泉州跃为东方大港后，数以万计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云集泉州，使之成为我国最早的三个伊斯兰教区之一。不仅金、丁、马、铁、郭、葛、黄、夏、蒲等十多姓的穆斯林后裔在这里生息繁衍，还建造了极具伊斯兰教色彩的清真寺、安葬伊斯兰先贤的灵山圣墓等，并留下了许多刻有阿拉伯文、波斯文和中文的墓碑铭文。泉州至今还保存有我国最早的清真寺。元朝时不少伊斯兰教徒跟随西域金吉军队经邵武到福州，因此邵武至今还有不少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在福建的传播主要是通过传教士进行的。明代时，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艾儒略等在明大臣叶向高的支持下，到闽北传教，并向福安、闽县等地发展 前后达 24 年 建有教堂 23 所，艾儒略曾被称为“西来孔子” 誉为开教福建第一人。明末 菲律宾教省派传教士 11 人抵厦门、福州 开创“多明我会”传教区 发展迅速，郑成功还曾聘传教士为老师。清康熙年间，以白伯多禄为首的一批传教士 深入泉州、兴化、福安等地传教 先后在福建成立“圣多明我第三会”。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不同派系的传教士在福建展开激烈的传教竞争 基督教建的教堂、学校、医院、救济机关，几乎遍及城乡各地。无论从传教和建教堂时间上看 还是从教派、教徒和教学数量上看 福建都较早 也较多。

除了以上四大宗教的影响外，福建的地方宗教也有很大的影响。最有名的是“三一教”。这是将儒、释、道三教合而为一的教派，由明代正德、嘉靖、万历年间福建莆田林兆恩所创建。林兆恩认为儒、释、道本为一体，但后世的继承者不懂其本源，妄分三教，越走越邪。倡三教合一的本质是将儒家的纲常伦理与道教的修持功夫及佛教的涅槃理论合而为一，三者缺一不可。所以他认为儒教为立本，道教为入门，佛教为极则。三一教在福建立足后，曾向外省和国外一些地方扩展过，清代中末叶曾发展到台湾、新加坡一带。福建的民间宗教颇为兴盛，其中最著名的是天上圣母、临水夫人、保生大帝这三“神”。这三尊神原型都是人，后被逐渐演化为神，赋予类人而又超人的“神”力，再借以护佑人们自身。民间宗教虽带有区域性，但其因有旺盛的生命力而持久不衰，对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海外文化的冲击。福建东临大海，良港棋布，有占全国五分之一长的海岸线，因此早在南朝时代，就与海外有联系。海外文化的冲击主要通过国际贸易、外商定居闽地、闽人越洋后归里等几个途径。早在五代王审知治闽时，福建与海外的商业贸易往来就比较广泛，东起新罗，中经南洋群岛，西至阿拉伯地区都与福建建立了初步的贸易关系。北宋时，泉州成为国际贸易港，被称为“涨海声中万国商”，与 36 个岛国有贸易关系。福建商人由泉州出发前往海外，一般一年往返，远的两年往返，用五色缣绢和建本书籍，与海外交换所需之物。到了南宋和元代，泉州发展为世界第一商港，明代统治者厉行海禁二百年之久，但位于龙海的月港依然帆樯如栉，海外客商汇聚，成为全国最大的走私港。明隆庆元年（1567 年）取消海

禁，月港每年孟夏之后，数百艘商船远洋四海。到明万历年间，月港的国际贸易更为繁荣。由于国际贸易的繁华，许多外商定居闽地。特别在宋元两代，数量极多的印度人、波斯人、阿拉伯人、欧洲人为世界贸易大港泉州所吸引，定居当地而不返，被人称为番客。而那些娶本地妇女所生的孩子，则被叫做半南番。他们将本国的风俗民情信仰融汇在当地居民之中，日久天长，海外文化便与当地文化水乳交融地渗透在一起。与外商定居闽地一样，也有不少闽人定居海外，宋元之后，逐渐增多，几乎遍及日本、朝鲜和整个东南亚。明代数万闽人出海后“往往久居不返 至长子孙”（《明史·吕宋传》），17 世纪前后 东南亚的福建华人已在 50 万人以上。这些华侨大多与家乡保持程度不同的联系，并时时有人回乡里探亲，带来形态各异的海外文化。

台湾文化的交融。台湾人有百分之八十祖籍福建，由于闽台一水相连 地缘相近 血缘相亲 习俗相同 语言相通 因此人们往往将闽台文化同划为一个文化区。但从另一个方面看，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台湾文化与福建文化，还是有一些差异，这就是台湾文化的独特性。必须看到，既然是交融，除了闽文化对台湾文化产生了深刻和恒久的影响外（这是主要的），台湾文化也对闽文化产生了影响。这些影响表现在多方面，如：（一）大量台湾人到闽地任职。《台湾省通志稿》对此有详细记录：“刘其灼 字汉章 号为轩，台湾府东安坛人。清康熙乙未（五十四年，1715 年）岁贡，雍正壬子 十年，1732 年）选受长泰县学训导，泰邑志称其清修自好 和易可亲。乾隆甲子 九年，1744 年 升长汀教谕 告

老归士子钱送盈余。据杨彦杰《台湾历史与文化》(海峡文艺出版社 1995 年版)介绍 在清领台湾期间 全台共有 80 名科举人物被派往福建任职。其中进士 1 名、举人 18 名、贡生 61 名。有的在福建连任教职。如进士庄久进 凤山县人 历任泉州、福宁教授。举人李维梓 台湾县人 历任闽县、安溪教谕。岁贡生林萃冈 台湾府人 历任兴化、清流训导。蔡复旦 台湾府人 历任闽清训导 漳平、永安教谕等等。台湾赴福建任职者分布很广 足迹几乎遍及沿海及山区各地 带来了台湾的本土文化 有的还撰文介绍台湾的风土人情。(二)台湾本土艺术输入福建。最有代表性的如台湾的“歌仔戏”输入福建。在台湾 18 个地方戏曲中,歌仔戏是唯一产生于本土的剧种,它发祥于台湾宜兰县,源自闽南的锦歌,经过台湾艺人不断加工、提高 终于成为完整的大戏 后又由台湾传入闽南 成为福建五大剧种之一的芗剧,至今已有 400 多个传统剧目 受到漳州、厦门观众的喜爱。(三)访祖探亲。闽籍台湾人返回闽地探亲时 带来了台湾的风俗民情。以饮食文化为例 每当夏季来临时 闽南街头常有人挑卖一种叫石花的食品 形同冰冻的藕粉膏 它是由薛荔藤汁制成 凉爽可口 已成为闽南人解渴消暑的佳品。薛荔性清凉 原产于台湾嘉义山中 由祖籍同安的居民发现制作,后由台湾的福建移民回乡探亲访友时传到福建。(四)经济贸易。台湾与福建早就有经贸往来 台湾历史上最早的郊行为北郊、南郊、港郊 其中南郊主要负责将货物配运闽南。台湾商人不仅将货运到闽南,还带来了台湾商人做生意的方式和生活习俗。

邻域文化的渗透。福建北连浙江,南接广东,西临江西,

这几个邻域的文化长期对福建渗透，特别在周边地区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 历史沿革。福建在唐以前称作“七闽”，其活动范围除了福建全境外，还北涉浙江温州，南入广东潮州，西接江西余干。春秋时期的越国为楚所亡后，纷纷进入浙江南部与福建境内。秦始皇时期设置闽中郡，这是福建历史上第一个区域建置，其辖地北部仍达浙江温、台、处三府，西部接江西铅山。汉代刘邦设闽越国，其辖地仍跨有赣东、浙东、粤东潮梅等地区。三国时，占据江浙的孙权把福建作为东吴的后方基地，置建委郡。唐玄宗时，取福州、建州各一字名为福建经略使，从此有了福建的名称。从历史上看，福建有不少辖地曾是今天邻省的辖地，因此与这些邻域关系始终很密切。

(二) 交通往来。唐中期之后，闽人与外界接触逐渐频繁，因应试、为宦、从商、访学等原因北上外出者增多，浙、赣为外出的必经之路。宋代，建州著名的分水关路由江西抵浙江，然后再北上，因此邻域文人来往较多。如黄升深受姜白石的影响，李虚己常与婿晏殊唱酬。明代闽地与江淮流域的交通也很发达，或由建阳往邵武入赣，或由浦城入浙，或由崇安入赣、浙。频繁便利的往来，促进了周边文化的渗透。

(三) 人口迁移。邻省长期陆续向闽地迁移人口，至明清达到高潮。如江西、浙江有许多农民迁移至闽北山区，为开发山区做出贡献。正如郑丽生《闽广记》卷六载：“延建诸邑深山中，每有客籍贫民，盖茅而居，或治畚田，或种菇，或烧松明，或烧炭，或煅铁，或造纸，或陶埴，因为地利，聚散无常，大抵江西上饶、玉山及浙江之庆元、云和之人为多。他们带来邻省文化，使土著人民效尤垦种者亦复不少，岁加稠密，连岗互嶂。”（道光《建阳县志》卷

二)当地人逐步“效尤”垦种经济作物 邻省移民人口起了重大作用(四)经济贸易。福建与周边毗邻地区的贸易一直极为频繁。如明人何乔远在《闽书》卷三八载：“建宁土地膏腴，专有鱼稻、油漆、竹布之利，以通商贾，邻于建昌藩邸，习尚移染，故其俗奢。”可见建宁与江西建昌府之间的密切关系。此外一些边远的小县，也常与毗邻展开经济活动。如泰宁的朱口牛会，就是每年秋季举行的跨省大型牛会，江西、浙江等周围几省数十个县的牛都被赶往此地交易，远近闻名。(五)互派官吏。闽人热衷科举，不少人被派往浙、赣任职，亦有不少浙、赣官吏在福建供职，促进了文化的互相渗透。

二 闽文化的特点

闽文化的独特形成过程使闽文化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多元性(也称碎状性)。闽文化与中原文化不同。中原文化具有正统性、传承性、稳固性、辐射性等特点，源于本地的正宗文化对外来文化有很强的征服、融解能力。闽文化缺乏一种征服力极强的正宗文化，谁也征服不了谁，谁也代表不了谁，由此形成一种碎状割据的文化形态。如闽中三山文化、莆仙妈祖文化、闽东畲族文化、闽西客家文化、闽南侨台文化、闽北理学文化等争奇斗艳，平分秋色。造成这种状态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外来文化相继进入福建时间极为漫长，甚至在福建还是土著民族时代就已开始，因此本地文化无法形成一种凝聚力。二是进入福建的文化成份极为复杂，五花八门，即使是中原文化，差异也很大。中原来闽人士中，既有文人学士，

也有起于田间的类似王潮兄弟这样的人。何况除了以上这六种文化外，还有其它文化，如畲族文化、客家文化等，对福建文化的渗透。所以任何一种外来文化到了福建都无征服力可言，不可能有绝对优势。三是福建地势复杂，既被称为“东南山国”，又被称为“闽海雄风”。一方面山区极为闭塞，甚至“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另一方面海港船只远航世界，常领风气之先。交通的不便和文化的差异，都极大地限制了文化的交流。

难融性。闽地民俗各异、风气相佐。比如莆田一直视读书习儒为首要之事，故“诗书礼乐为八闽之甲。莆之科目，肇于唐，盛于宋，又盛于明，每科与试者，视闽居半”（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上编），而与莆田相邻的福清却以贾为业，“福清背山面海，多潟卤，有海舶之利。其人刚劲尚气，多行贾于四方，以其财饶他邑”（何乔远《闽书》），最典型的是闽语的复杂性。在全国八大汉语方言中，福建方言就占三种，如果加上省界交叉地区，仅福建境内流行的就有汉语七大方言，可以说是全国汉语方言的缩影。而其复杂性还在于同一方言区，如闽南方言区中的厦门话、龙岩话、大田话、尤溪话之间也有很大差异。有的县或乡内，竟没有一种统一的方言，甚至有的地方过一座山、一条河就不能通话。这种现象是全国罕见的。闽文化的难融性还表现在良莠共存。《宋史·地理志》曾称福建“向学喜讲诵，好为文辞。信鬼神祠，重浮屠之教”。一方面重教育，是全国文化最发达地区之一，不少县市被称为“文献名邦”；一方面又信鬼神，不惜重金建庙。难融性使闽文化更加丰富绚丽。比如福建的戏曲不像其它省市那样，有一种为全省人民普遍接受的戏曲（如北京的京剧、浙江的越剧、四川

的川剧)福建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戏,很难说哪一种戏最能代表福建。除流行于各城市的闽剧、莆仙戏、梨园戏、高甲戏、芗剧这五大剧种外,还有二十多个大小剧种流行于各山区沿海。仅今日可查的地方剧目就多达一万五千多个,故有地方剧省之称。正是由于福建的地方剧难以互相交融,所以在莆仙戏、梨园戏和南曲中,始终保留着一些宋元南戏的剧目,一些古本和古曲在国内其它剧种中早已绝响,而唯独在福建可以听到它的遗音。

双向性。这种双向性是由于福建地僻东南一隅,濒海多山,既开放又封闭而造成的。武夷山的静穆清幽,刺桐港的富庶繁华,孕育出福建文化的双向性质:朴实务实又灵敏洒脱,尊重传统又勇于开拓,留恋乡土又热衷外出……。这种双向性可合可分,有很大的适应性和可塑性。

不平衡性。这种因山、海造成的不平衡比比皆是。在经济上,如闽东、闽西、闽北一些山区经济发展缓慢,甚至连糊口都成问题,而另一些地区,如福清、晋江等却能领风气之先,往往在经济旋涡起于青萍之时就卷进去。特别一些海外文化特征较为明显的地方,如晋江陈埭镇的居民有不少是海外来泉州的伊斯兰生意人后代,他们商品意识极浓,沿绵至今。这种不平衡还表现在人才发展上。福建人才不是在各区域同步发展,杰出人物最早集中在闽北山区,如朱熹等,后又集中在闽南泉州等地,近代却几乎都崛起于福州的侯官和闽县(这两个县于1912年合并为闽侯县,属辖福州)。侯官崛起的杰出人物如林则徐、沈葆楨、严复、林纾等,无论是政治家、军事家、翻译家、文学家都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如果没有

这些人物，中国近代史也将黯然失色。在一个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弹丸之地，能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崛起如此之多杰出人才真是奇迹。

延伸性。由于福建地僻一隅，人多地少，因此向外延伸，以求发展成为闽地特别是沿海地区的传统，故有“门字里面是条虫，跳出门外便成龙”之说。闽人的延伸性，主要有三个方面：（一）向海外延伸。祖籍福建的华侨、外籍华人有八百多万，分布在全世界五大洲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约90%居住在东南亚，不少人都获得成功，最新一期的美国《福布斯》杂志刊出全球前十大华人富豪，其中有四名祖籍福建，并都在东南亚从商。即：祖籍石狮的菲律宾亚洲世界集团郑周敏（资产总值130亿美元，排名第一）祖籍福清的印尼三林集团林绍良（80多亿美元，排名第四）祖籍晋江的菲律宾巨商陈永栽（70亿美元，排名第八）祖籍福州的马来西亚郭氏集团掌门人郭鹤年（70亿美元，排名第九）。（二）向台湾延伸。闽南移民中有句俗语：“第一好过番，第二好过台湾。”经过长期移民，台湾有80%的人祖籍福建，福建移民成为台湾居民的主体。（三）向内地其他省份延伸。闽人中不少人成为某个领域之出类拔萃者，如当代福州，学部委员之多居全国之首，因而被称为“学部委员之乡”。此外，在文学艺术上的对外影响也是明显的，如严羽对诗歌的见解一直影响到王渔洋。

易移性。因受多方面因素影响，闽文化不会长期在某区域发展，其发展中心容易转移，如唐代漳州文化、五代闽国文化、宋代建州文化、元代泉州文化、明代月港文化、晚清侯官文化等，都曾各领风骚。

第二章 哲 学

一 闽学发展概述

福建最大的哲学学派是闽学。

对于闽学，有多种不同的解释。如：1、闽学即朱熹学说。朱熹是闽学集大成者，朱熹与闽学关系极为密切，但闽学与朱熹学说并不完全相同，因为闽学不仅限于朱熹一个人思想。早在朱熹之前，闽学就开始酝酿并初步形成，就是在朱熹生活的南宋，闽学也还包括朱熹门人的思想；且元明清时期的闽学，一些闽学家在捍卫朱熹学说基础上又有许多新发展。2、闽学即理学。广义的理学，泛指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为中心的整个哲学思潮，包括各种不同学派。以宋代为例，就如周敦颐的“濂学”、邵雍的“象数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司马光的“朔学”、陆九渊兄弟的“江西之学”而“闽学”只是宋代诸学派中的一个学派。狭义的理学，是指“程朱理学”。“二程”与“闽学”不同显而易见，朱熹学不能等同闽学，上面业已陈述。3、闽学是与濂学、洛学、关学相并列的一个流派。明代

宋濂、薛瑄及清代蒋垣都将濂、洛、关、闽并论。这种说法的缺陷是将“闽学”凝固在宋代而实际宋代以后闽学又有新发展。如要并论那么明代王守仁的“阴阳学”（或称王学）岂不也可并列？4、闽学即闽中之学。这种说法太笼统。福建历史上闽中之学包括文史哲等学，而闽学仅指理学。什么是闽学呢？简而言之，闽学应该包括以下几个特点：1、从地域上看，闽学产生、发展于闽地，其核心人物皆为闽人；2、从时间上看，闽学萌芽、产生于北宋，至南宋朱熹为集大成者，在朱熹门人及许多忠于朱熹学说的闽人努力下，闽学在元明清不但兴盛，而且有新的发展；3、从哲学学派上看，闽学即福建理学，其思想核心是天理论，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理学思潮的主要代表；4、从影响上看，闽学曾由地域性上升为全国性并成为中国后期封建社会的正宗思想。

北宋仁宗时期是闽学的萌芽阶段。一批闽地学者注重对儒家经典研究，不重训诂重义理，提倡儒家道统，宣扬儒家“尽天知性”之说，强调儒家伦理常纲，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并热衷于授徒讲学。代表人物如陈襄、郑穆、陈烈、周希孟等“闽中四先生”及刘彝、黄晞、章望之等耆儒。在“闽中四先生”中，陈襄最为重要。陈襄（1017—1080年）字述古，福州侯官（今闽侯）古灵人，曾任浦城等地方官多年，注重办学，曾劝县中富人出资建筑学舍三百楹，自己也常为诸生讲学，并作《劝学》，劝使年青人就学。其施政多效古人所为，平日以讲求民间利病为要务。其歿后，书篋中皆满纸小字书写有关人民疾苦之事。陈襄主张以仁义治天下，用封建伦理纲常来规范人们行为。

《宋元学案·刘胡诸儒学案》中说：“闽中自古灵先生倡道，其后

游酢、杨时、胡安国三子得程氏之传。”可见陈襄是闽中最早推行理学的先驱。郑穆（1022—1092年），字闾中，侯官人，《宋元学案·古灵四先生学案》称其“深造于道，心仁气正，勇于为义，文博而庄”；其言行以圣人为法，进退容止依《礼经》。刘彝（1022—1091年），字执中，闽县（今福州市）人。据《三山志·公廨二·庙学》载：熙宁二年（1069年）神宗问刘彝：胡瑗与王安石哪个文章好？刘彝回答：胡瑗以道德仁义教东南学生，那时王安石尚在准备考试进士。圣人的道理，有体、有用、有文。凡是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久而不变的叫做体；诗书、史传、子集能流传后世作参考的叫做文；治理天下，使恩德普及人民的叫做用。国家历朝取士，不注重体和用，但注重浮华的文章，所以风俗浅薄。胡瑗在宝元、明道年间（1038—1040年），明体用之学，所教授的学生，有二千余人。现在学者能懂得体用是政教之本，都是胡瑗的功绩。胡瑗是中国理学发端时期著名的“宋初三先生”之一，刘彝为胡瑗高足，其重道德而轻科举、重儒家性理之学而排斥词章之学，与胡瑗是一脉相承的。黄晞（？—1057年），字景微，自号聱隅子，建安（今建瓯）人（按：《四库全书总目》言黄晞为蜀人，实误。《玉壶清话》、《闽书》、《宋元学案》、《八闽通志》皆以黄晞为闽人）。一生无职无官，以潜心于儒学著称。精研《春秋》、《周易》。曾说：“左氏凡例，得圣人之微，郑康成象数，极天地之蕴。”（《聱隅子·生学篇》）对中国理学“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闻其名，欲聘其讲学，固辞不就。其“书中言论不诡于正，体裁文句皆规抚扬雄《法言》”。王应麟《玉海》直著为儒家，似可无愧也。（《四库全书总目》）其《聱隅子》阐发圣人道义之隐